

东南亚
研究丛书

DONGNANYA
YANJIUCONGSHU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王皇后裔与叛乱者

——
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

◎牛军凯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山大学『985工程』资助

王皇后裔与叛乱者

——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

◎牛军凯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
/ 牛军凯著. —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2.11

ISBN 978-7-5100-5412-9

I. ①王… II. ①牛… III. ①家族—研究—越南②中
越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明清时代 IV.
①K833.309②D829.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7335 号

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

策划编辑：刘正武

责任编辑：程 静 张东文

出版发行：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编：510300)

联系方式：020-84451969 84459539

<http://www.gdst.com.cn> E-mail: pub@gdst.com.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广东天鑫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mm × 1230 mm 1/32

字 数：281 千

印 张：11.875

书 号：ISBN 978-7-5100-5412-9/K · 0156

定 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咨询、投稿：020-84460251 gzlw@126.com

明末清初的中越关系：理想、现实、 利益、实力^①

(代序)

孙来臣

费正清：“(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搞清理想与现实、表面宣称与具体措施之间的关系。”^②

吴士连：“南北强弱，各以其时。当北方之弱则我强，北方强则我亦为之弱。天下之大势也。”^③

我和军凯认识首先是以文会友，在2003年读到他有关南明与安南关系的文章，当时我就觉得文章写得不落俗套，令人耳目一新。2005年，我在国家图书馆又读到军凯的博士论文《朝贡与邦交——明末清初中越关系研究(1593—1702)》(中山大学，2003年)，更觉得他功底深厚。此后，又听到国内朋友孙衍锋和日本同事莲田隆志对军凯治学精神和学术水平的称赞。2008年，和军凯终于在南宁见面。军凯的朴实无华、矢志于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得知我们既是河南老乡，又是郑州大学历史系系友)。我记得在南宁问起军凯博士论文修改成书的情况，军凯口气肯定地回答说还不成熟，尚

① 本人谨感谢牛军凯、郑永常、桃木至朗、莲田隆志、约翰·惠特莫尔(John K. Whitmore)、白凯琳(Kathlene Baldanza)、卫思韩(John E. Wills, Jr.)、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李焯然提供材料和帮助。

②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2-3. 除非特别指出，所有译文皆本人翻译。

③ 吴士连等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6年)，上册，第153页。

需时日。当时我强烈感觉到军凯不求速度、注重质量的风格。后来我又了解到北京大学学者们编写《东南亚古代史》，特邀军凯参加，这样军凯就成为北大以外唯一参与该书编写的作者，足见国内东南亚史学界对军凯的器重。国内研究东南亚历史者愈来愈少（不少人都转而搞现状去了），而专攻古代史者则更是凤毛麟角；因为钻故纸堆、啃外语（大语种还不够，还要小语种），却是不能快出、多出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军凯不是国宝，也是稀有人才了。两年前我又得知军凯要去法国巴黎进修一年，非常为他高兴，因为我一直深切觉得中国的东南亚研究需要与世界交流。2011年4月，军凯突然发来邮件，寄来博士论文修改稿，嘱我写篇序言，并特别强调说到他“希望能得到一篇真正的学术批评的序言”。军凯大作专讲中越关系，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而且又不懂越南文，但鉴于军凯情真意切，只好勉为其难。为了不辜负军凯厚望，本人除了反复拜读军凯的大作外，特地阅读和重新阅读有关著作，旨在写出“真正的学术批评”。围绕军凯的大作，我也将介绍一些国外有关的著作，并谈一些我对中越关系史的看法。

一、选题的意义

军凯《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以下简称《王室后裔》）是继郑永常《征战与弃守——明代中越关系研究》（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出版组，1997）和孙宏年的《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之后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又一部有关中越关系史的力作。该著作以越南莫氏家族为主线，探讨了明末清初中越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明清两朝对莫、黎政权的双重承认和最后放弃，1592年后莫氏高平政权建立的详细过程，南明王朝和越南的关系，1682年后莫氏后裔的

复国过程及清朝的对策，乾隆年间安南黄公纘投诚清朝的过程，明清王朝变更与中越朝贡制度、礼仪的变化，以及边境土司、割据势力对中越关系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讨论《王室后裔》在选题上的意义。

第一，《王室后裔》的选题对中国“朝贡模式”的研究有直接而重要的意义。中外学者们对近代以前中外关系的称呼名目繁多，包括“中华世界秩序（Chinese World Order）”、“朝贡制度”、“朝贡关系”、“封贡体系/贡封体系”、“宗藩制度”、“天朝礼仪体制”、“华夷秩序”等等。^①本序所采用的“朝贡模式”一词是美国学者白凯琳的提法，因为我觉得用该词词义广泛笼统，用来概括总体上的中外关系比较合适。^②而对越南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我则选择军凯所采用的“朝贡关系”。近代以前中外交往历史悠久、情况复杂，牵涉亚非欧广大地区的多个国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技术等等，其内容和实质因时、因地而异，以费正清为首的学者们在20世纪中后期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其代表作为 *The Chinese World Order*）。此后，中外学者从不同方面进行了诸多可贵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果，^③但对中外关系的定性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是有盲人摸象、各执一词的味道。究其原因还主要在于近代以前中外关系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跨度大、资料多、语言杂，

① 这方面的讨论很多，可参考陈志刚：《关于封贡体系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清华大学学报》6（2010）（http://www.iqh.net.cn/zhongwai/info.asp?b_id=2&id=354）。

② Kathlene Baldanza, “*The Ambiguous Border: Early Modern Sino-Viet Relations*” (Ph. 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0), 13–21.

③ 除了中、日、韩学者的著作外（恕不一一列举），亚洲学者较少讨论的是卫思韩的著作，特别是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84)。此外可参见 Zhang Feng, “Rethinking the ‘Tribute System’: Broadening the Conceptual Horizon of Historical East Asian Politic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 (2009): 597–626; Anthony Reid and Zheng Yangwen, eds., *Negotiating Asymmetry: China's Place in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而学者们的视角和意识形态(包括民族主义)又各不相同,要想把握整个跨度、穷尽所有文种的资料、进行总体的研究、比较和概括,这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还需要相当长甚至一两个世纪的时间。^① 全海宗就指出:“如果想要正确理解过去的韩国历史,就必须彻底弄清韩中间朝贡关系。”^② 费正清的高足、南加州大学退休教授卫思韩这样谈道:“我对这一问题(朝贡制度)反复思考长达四十年之久,但是仍然没有把它理顺。”^③ 这既是谦虚,也是事实。说他谦虚是因为卫思韩在研究欧洲人与朝贡体制的关系上成绩斐然;说是事实是因为欧洲人只是庞大的朝贡体制中的一部分。本人相信持续、深入的研究会逐渐克服这种盲人摸象的状况,尽可能接近历史事实、还原历史真相。

因为越南与中国有着悠久而特殊的关系,所以研究这种关系对中国朝贡模式的理解至关重要。尽管历史上的中越关系长期受到较多的关注和研究,但因为缺乏比较研究,越南在整个朝贡模式中的地位并不是特别清楚。例如,庄国土认为,只有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才具有实质意义的宗藩关系;古代中国和东南亚朝贡关系的最主要动力是贸易,所谓的“朝贡制度”是虚幻的,是为了“满足中国统治者虚骄心理的自我安慰”,其中越南和中国的外交关系也不例外(只有元朝初年的中越关系属于真正的“宗藩关系”)。^④ 本人以前主要从缅甸看中

① 以本人最熟悉的中国和缅甸的关系而论,中国大陆学者在过去五六十年间所撰写的中缅关系史还有许多不足,其中包括缺乏系统研究、未将其置于朝贡模式的大框架下进行考察、没有掌握缅甸资料以及浓厚的中国中心主义。本人正在撰写 *Burmo-Chinese Historical Relations*, 中文译名即为《缅中关系史》。

② 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30。

③ John E. Wills, Jr., “Great Qing and Its Southern Neighbors, 1760–1820: Secular Trends and Recovery from Crisis”,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actions: Regional Studies, Global Processes,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February 28–March 3, 2001 <<http://www.historycooperative.org/proceedings/interactions/wills.html>> (4 Nov. 2011)。

④ 庄国土:《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厦门大学学报》3(2005):1–8。

国，也看不出朝贡“制度”的存在。这些都对中越关系史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王室后裔》正是可以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

此外，《王室后裔》所关注的时期更为中国朝贡体制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明末清初中越关系具有中国与其他关系中罕见的特殊性，即对中国来讲，面对的不是某一国家的单一政府，而是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政府。这就要求中国的外交政策适应新形势，做出新对策。这种情况，在明末清初的中越关系中持续一个半世纪（1527—1677年）甚至更长（直至1788年越南南北分裂的局面最后结束），不仅为中越关系中所仅见，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从未或很少发生过。因此，这个中国外交中的特殊现象当然值得研究，其所揭示的结论当然也对中国朝贡模式的理论和现实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在越南史和中越关系方面，《王室后裔》选题本身具有非常重大的学术意义，更是填补空白之作。16世纪初莫登庸建立的莫朝（1527—1592年）因为其非正统或“伪朝”地位，多年来一直是越南历史研究中的禁区，结果是造成越南国内外关于这方面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前基本上是一片空白，而美国学者惠特莫尔和日本学者大泽一雄在20世纪60—70年代发表的有关莫朝及其与中国关系的文章则是少有的例外。^①自20世纪末期以来越南学者才开始从事零星的研究，而2003年丁克顺在法国巴黎撰写的博士论文系该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②在中国，越南莫朝的历史已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兴趣，产

① John K. Whitmore, "Mac Dang-dung", in L. Carrington Goodrich, ed.,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2: 1029-1035; 大泽一雄:《黎朝中期の明・清との関係(1527—1682年)》, 载山本达郎编《ベトナム中国関係史: 曲氏の抬頭から清仏戦争まで》(东京: 山川出版社, 1975), 333-404; John K. Whitmore, "Chung-hsing and Cheng-t'ung in Texts of and on Sixteenth Century Vietnam", in K.W. Taylor and John K. Whitmore, eds., *Essays into Vietnamese Past*. (Ithaca, New York: Southeast Asian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1995), 116-136.

② Dinh Khac Thuan,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a dynastie des Mac(1527-1592) au Viet Nam"(Ph. D dissertation, Paris, 2003).

生了两篇硕士论文。^①在美国,莫朝及其与中国的关系直到最近才引起学者的兴趣,在2010年连续有两篇博士论文完成。^②所有这些论著不同程度以1527—1592年的莫朝为主题,尚未涉及莫氏王朝失去政权后、在越南北部高平地区建立地方政权以及该政权与中国关系的历史。目前有关中、莫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在资料的运用、观点的阐述,还是在对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有许多欠缺之处,因此存在亟待提高的空间。而《王室后裔》正可谓是补缺之作。

第三,在东南亚历史研究方面,《王室后裔》一书的出版正好可以加入内外因素如何影响东南亚历史发展的讨论。海外东南亚研究长期以来围绕内外二因孰轻孰重的问题展开讨论,两派学者的力量虽然大致看起来此消彼长、难分轩輊,但总的看起来“外因派”略占上风。简单来说,两派争论的轨迹最先是外因派(欧洲中心派)首开东南亚研究的先河,然后是内因派(“自主历史派”)将外因派彻底推翻,再到学界对外因的肯定但又不排除内因。^③经过几番争论之后,就东南亚海道历史的发展来言,外因派的观点显得更接近历史事实。前者以荷兰、法国和英国帝国主义历史学家为代表,强调欧洲人依仗其高超的组织才能、技术和精神从进入东南亚的水域开始就对东南亚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而以乔治·塞代斯(George Coedes)、范·乐(J. C. van Leur)、施礼克(B. J. O. Schrieke)、约翰·斯

① 袁运福:《略论越南历史上的莫朝》(郑州大学硕士论文,1998);钟小武:《明朝对安南莫氏的政策(1527—1597)》(中山大学硕士论文,2000)。

② Kathlene Baldanza, “*The Ambiguous Border: Early Modern Sino-Viet Relations*”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0); Brian Zottoli, “*A History of Cochinchina*”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10)。

③ Lieberman, 1: 7–23; J. D. Legge, “*The Writing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ed. Nicholas Tarl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Vol. 1, Pt. 1, “From early times to c. 1500”, 1–32; Michael Arthur Aung-Thwin and Kenneth R. Hall, “Introduction”, i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Southeast Asia: Continuing Explorations*, eds. Michael Arthur Aung-Thwin and Kenneth R. Hall (London: Routledge, 2011), 5–8。

米尔(John Smail)为代表的自主派则认为,直到19世纪早期欧洲的影响非常肤浅有限,而地方文化和经济的律动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现在,海岛地区专家们也都同意,尽管葡萄牙人的影响非常有限,但到了1700年前后荷兰人对东南亚海岛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极大改变了其经济、政治,甚至文化生活。^①转到越南,针对近代以前的越南到底属于“东亚”还是“东南亚”这个西方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李伯曼更加强调中国的影响。他指出,与中国的互动对越南人自我意识的形成要比越南与占婆、高棉或泰国人的战争要重要得多;在经过15世纪的宋明理学革命之后,特别是上层社会(但也不仅仅限于上层社会)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组织都采用中国模式。^②

从过去十年间国际上有关中国和东南亚关系史方面的著作来看,中国的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和强调。早在2002年,专门研究越南和印度支那当代史的克里斯托弗·格沙(Christopher Goscha)就为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年会组织了小组会议,题名为“大陆东南亚战争中的外国军事技术传播:改进、拒斥和变化”。次年,会议上的三篇文章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杂志》上发表。^③格沙在其序言中说,西方殖民统治结束之后,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者在重建过去历史的过程中着重强调本土因素和国粹,而贬低或否认外国和外来的因素。他形象地描述说,在这些民族主义者看来,“就像现代的民族国

① Victor Lieberman, “Local Integration and Eurasian Analogies: Structuring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c. 1350–c. 1830”, *Modern Asian Studies* 27, 3(1993): 557–558.

② Lieberman, “Local Integration”, 539.

③ 这三篇文章是 Sun Laichen, “Military Technology Transfers from Ming China and the Emergence of Norther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4, 3(2003): 495–517; Frédéric Mantine, “The Transfer of Western Military Technology to Vietnam in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The Case of the Nguyen”, 519–534; Christopher E. Goscha, “Building Force: Asian Origins of Twenty-century Military Science in Vietnam(1905–1954)”, 535–560. 前者有李新平、邱普艳中译本:《明代中国军事技术的传播和东南亚北部大陆的崛起(1390—1527年)》,先后发表于《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2005): 27—39和范宏贵主编:《论说东南亚》(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239—269.

家那样，东南亚之魂的形成全在于其内在的特色，而没有受到中国和西方这些外来影响的玷污……”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处于真空之中，而他们的过去也同样没有与外界孤立隔绝。东南亚地区的内在联系，其在纵横交错的陆路海道中所处的中心位置，以及其鲜明的社会文化多样性和活力都不支持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孤立隔绝的说法，而在涉及追溯和理解外国军事知识和技术传播到大陆东南亚时则更是如此”。^①而这三篇文章主旨正在于展现在14—20世纪期间外国军事技术（中国、法国、日本）对大陆东南亚地区历史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2010年出版的《中国与15世纪的东南亚》，实际上专门探讨明朝早期中国对东南亚地区（也包括部分华南地区，尤其是广西和云南）的影响。两篇序言以及12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东南亚的大陆和海岛地区进行了深入研究，中国对东南亚的重要性跃然纸上。^②2011年出版的两部新书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一部为《中国流通：东南亚的资本、商品与网络》，时间跨度远较前一著作为大，主要探讨近世与现代中国的技术、商人、资本、劳力对东南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尽管两位编者在序言中并没有突出中国影响这一主题，但为该书作序的王赓武这样指出，东南亚和中国之间大量的商品流通使得“中国人在发展（东南亚）当地经济中的作用变得举足轻重、不可或缺”^③。

另外一部名为《继续探讨东南亚历史和历史编纂学的新视野》。两位编者之一迈克尔·昂吞为“自主历史”的主要追随者和实践者，

① Goscha, "Introduction", 491-492.

② Geoff Wade and Sun Laichen, eds., *Southeast Asia in the 15th Century: The China Factor*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③ Eric Tagliacazzo and Wen-Chin Chang, eds., *Chinese Circulations: Capital, Commodities, and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一向强调东南亚历史发展中的本地因素。将近20年前我在北伊利诺伊大学选修其开设的课程（他后来赴夏威夷大学执教），他首先要求学生阅读约翰·斯米尔与哈利·班达（Harry Benda）的有关“自主历史”的文章。在昂吞和肯尼思·霍尔为该书合写的序言中指出：“我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已经修正了我们以前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并且承认印度和中国两大文明对东南亚文化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他们还指出，尽管“地方化”（localization）的观点大致上仍执牛耳（这一观点当然值得商榷），但该书所收的几篇有关越南的文章都比较强调在近世时期中国对越南的影响。^①受“自主历史”的影响，在越南历史的研究中存在一种偏袒、强调（privilege）越南方面的倾向，但最近廉姆·凯利的著作对这种倾向进行了必要的纠正。^②即使一贯强调东南亚地区历史独立性的惠特莫尔也从不低估中国的影响。例如，多年前他曾指出明朝在15世纪初对越南的入侵和占领为宋明理学在越南的立足和发展铺平了道路，导致越南接受中国明朝模式，其影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③最近，他又发人深思地提出宋朝的海外贸易波澜壮阔、影响深远，从人力、技术与思想文化各方面都为具有地利之便的越南注入了巨大活力，结果是导致越南北部沿海地区在11—13世纪产生有别于李朝首都（升龙，今河内）地区原有的（寺庙）经济和（佛教）文化的新经济（由宋朝国际贸易所催生的市场经济）、新文化（中国古典文化）以及最后的新朝代（陈朝）。陈朝祖先来自福建，在

① Aung-Thwin and Hall, eds., *New Perspectives*, 6. 我想他们主要是指下列三篇文章：Sun Laichen, “Chinese-style Firearms in Southeast Asia: Focusing on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75–111; Li Tana, “The Imported Book Trade and Confucian Learning i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y Vietnam”, 167–182; Keith Taylor, “Literacy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Northern Vietnam”, 183–198.

② Liam C. Kelley, *Beyond the Bronze Pillars: Envoy Poetry and the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hip*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16–17.

③ “Chiao-chih and Neo-Confucianism: The Ming Attempt to Transform Vietnam”, *Ming Studies* 4(1977): 51–91.

越南沿海地区捕鱼为生。宋朝的贸易使得陈氏家族在经济上崛起，并在文化上吸收了来自中国的新文化，并最终于1225年取代李朝。一言以蔽之，就是越南在李、陈之交的新经济、新文化和新朝代都得益于宋朝中国的海外贸易的大潮。^① 惠特莫尔以其独特的眼光和视角、深厚的历史感以及鞭辟入里、发人深省的分析，生动展现了中国对越南历史发展的重大影响。

中国的影响对越南人来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中国幽灵”(the Ghost of China)。从文化层面来讲，在越南1954年独立之后去殖民化的过程中，越南人无法漠视中国文化的存在和影响，这是因为中国正是所谓纯正越南文化的根源；因此，越南学者“去中国化”或者疏离中国文化的过程极度痛苦，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割断和中国的文化联系就等于割裂了越南的历史。^② 陈重金早在20世纪初就精辟地指出：“(中国文明)的这种影响年深日久已成了(越南人)自己的国粹，即使今天想清楚它，也不易一时涤荡干净。”^③ 有鉴于此，研究越南历史，如果忽略或低估了中国的影响，就会如雾中看花，模糊不清。中国对越南的巨大影响不仅表现在近代以前，而在当代也是如此。基思·泰勒就曾说过：“即使20世纪的越南在文化和政治生活方面重新调整方向，大大远离‘此前的’中国‘模式’，但中国对越南的影响永远不会是无足轻重。法国人来而复去；日本人来而复去；美国人来而复去；苏联人也来而复去。但只有中国却一直没有离去，

① “The Rise of the Coast: Trade, State and Culture in Early Dai Viet”,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7, 1 (2006): 103-122.

② Patricia M. Pelley, *Postcolonial Vietnam: New Histories of the National Pas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25-131.

③ 陈重金著，戴可来译：《越南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

而且也永远不会离去。”^①当前由于中国的崛起而对越南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与越南（还有菲律宾）在南海的纷争，更凸显了中国因素对越南的重要。

第四，《王室后裔》（以及郑永常、孙宏年、白凯琳的著作）可以纠正长期以来关于中越关系的这样一个刻板印象：战争，战争，还是战争。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加上越南在20世纪又不幸被卷入长达30年的战争（1946—1975），历史上的中越战争成为历史研究的重点，而越南国内外越南历史的研究也都被蒙上了“战争”的阴影。这样，反抗外国军事侵略被突出为越南历史上的两大主题之一。^②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美国学术界针对越南对中国的态度问题上的变化。美国的一些学者对中越战争和越南人对中国的态度的看法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以前的“反抗外来（中国）侵略”为越南历史上的主旋律之一，一改而成中越之间不仅仅是紧张的关系和战争，也有长期的和平交往；战争只是例外，而和平才是根本的；越南人之间的内战的次数要远远超过他们抗击外来侵略战争的次数。^③到此为止，这种转变是可喜的，因为新的看法更接近历史事实。但是，在这种看法的转变中，也存在矫枉过正的倾向。例如，“在20世纪以前越南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冲突都是越南人对抗越南人，而不是对抗外来敌人。胡志明与此前的越南人都不痛恨中国人，而事实上他们都和中国的盟友有着友好的合作”。^④不可否认，中越战争虽然是历史事实，但绝对不是中越

① Keith W. Taylor, "China and Vietnam: Looking for a New Version of an Old Relationship", in *The Vietnam War: Vietnamese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eds. Jayne S. Werner and Luu Doan Huynh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1993), 280.

② 潘辉黎等著，戴可来译：《越南民族历史上的几次战略决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Keith Weller Taylor, *The Birth of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xviii.

③ Taylor, "China and Vietnam", 283; Taylor, "The Vietnamese Civil War of 1955–1975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riumph Revisited: Historians Battle for the Vietnam War*, eds. Andrew Wiest and Michael Doidge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17–28.

④ Mark Moyer, *Triumph Forsaken: The Vietnam War, 1954–19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xiii.

关系的主旋律，更多的时间则是在朝贡关系下的和平相处，既包括使节来往、边界摩擦和谈判，也包括文化、经济的交流等等。

第五，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王室后裔》着重阐述的外交史（即中国国内通常所说的“关系史”）虽然不是独辟蹊径，但也是历久弥新。从19世纪专职历史学在德国诞生初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政治史（包括外交史）是历史学家的宠儿，历史研究成了清一色的政治史。作为对这一潮流的反动，法国年鉴派在1929年应运而生，大力提倡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等）联手，目的在于构建“整体历史”。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随着年鉴学派原著被翻成英文，年鉴学派一时声誉鹊起，名声大噪，而年鉴学派的著作也因此洛阳纸贵、不胫而走。但是，没有十全十美的学派，年鉴学派也受到各种批评，其中之一就是其对政治史的忽视（看来是矫枉过正了）。如果只有政治史，那么历史当然显得单调枯燥、狭窄片面；但没有政治史，历史又少了一大块，所谓的“整体历史”也就残缺不全了。看来，要建立真正的整体历史，各种历史不可或缺。而在中国，特别是东南亚研究方面，政治史、外交史/关系史从来没有遭受过冷落。从这个意义上讲，专注中越关系史的《王室后裔》即是薪火相传。建构整体的越南史，越南的对外关系史必不可少，而越南和中国的关系在近代以前更是至关重要，不可替代。尽管越南史和中越关系史有不少有待拓宽的领域（如妇女史/性别史、环境史、技术史），但基于中越两国历史关系的至关重要性（尤其是对越南来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越之间的政治关系史或外交史（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文化联系）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所以说，军凯认为“中越之间的朝贡关系、中越之间的冲突与战争不再是学术关注的焦点”，并不完全正确，上面提到白凯琳和布莱恩·尤托里（Brian Zottoli）的博士论文就说明西方学术界对中越朝贡关系的注意与兴

趣。此外还有更多学者关注中越陆路边界的交往。^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朝贡关系成了关注当代现实问题的政治学家们的美味佳肴。吴本立从历史上的中越关系出发，提出了具有重大影响的“非对称关系”的概念，康大卫则利用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对以中国为中心、明清时期的东亚秩序进行了总结，目的在于以史为鉴，展望未来的东亚国际秩序。^②由此看来，朝贡关系绝对不是不重要，而是需要以敏锐的眼光，站在一定的高度去发掘意义重大的课题。

二、《王室后裔》的重要贡献

军凯积十年之功，以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细致入微的研究方法，对莫氏王朝后裔与中国近两百年的关系进行了重建，填补了越南史、中越关系史、亚洲朝贡制度史以及东南亚史研究中的一块空白，在史料运用、观点阐述等方面有重大突破，是中国东南亚历史研究领域尚不多见、三才（史才、史学、史识）俱佳力作。

《王室后裔》最大的贡献在于对亚洲朝贡制度（模式）史的理论贡献。中国近代以前的朝贡制度长期以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因此这方面的研究也就层出不穷，而对是否有一个“朝贡制度”的存在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这样的制度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朝贡制度”只是虚幻的，是虚构出来的。《王室后裔》通

① Bradley Camp Davis, "States of Banditry: The Nguyen Government, Bandit Rule, and the Culture of Power in the Post-Taiping China-Vietnam Borderlands"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08).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的在读博士 Alexander Ong 的博士论文题目也是围绕 17-18 世纪清朝和越南的陆路交往。

② 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David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后者第一章其中一节 (5-8 页) 的题目即为 "What history can tell us about today".

过对中越朝贡关系的个案研究，肯定了朝贡制度的存在，但也同时揭示了这种制度的灵活性和现实主义（即军凯所说的理想与现实的结合）。该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关注华南（两广和云南）地方官员在中越实际的、错综复杂的朝贡关系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特别是两广总督陈大科和左江道副使杨寅秋的“不拒黎，不弃莫”政策的提出及其贯彻执行），并着重研究了中国明清两朝在特殊情况下对越南王朝所进行的“双重承认”，这样就修正了费正清所构建的只着眼中央、只强调朝贡仪式、只注重连续性、一成不变的“中华世界秩序”，使得朝贡制度更丰富多彩、有血有肉，而且灵活多变。从越南史和东南亚史的角度出发，该著作凸现了中国在越南和东南亚历史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和从陆路通道（两广和云南）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纠正了那种片面强调中国单从海路影响东南亚历史发展的“海洋思维”（Maritime Mentality）。^①越南历史上的贡道一向是通过陆路，由广西进入中国，途经内地数省而到达中国首都，1829年越南阮朝经由海道入贡的请求被清廷认为不符合惯例而予以驳回。^②

《王室后裔》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和突破就是对历史材料的空前占有和掌握。除了引用大量第二手中、越论著以及一些英、法、日论著外，作者皓首穷经，耗时十年，在中国、越南和法国广泛搜集资料，引用中文古籍74种，越南汉喃古籍113种。反复阅读该著作，本人强烈感觉到所引用资料极其翔实、字字句句有根有据，作者坐冷板凳、水滴石穿、刨根问底、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跃然纸上。

《王室后裔》在其他论点上也有突破。如果只有大量资料而没有

① Sun Laichen, "Ming-Southeast Asian Overland Interactions, c. 1368-1644"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0).

② 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70—71；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越南缅甸泰国老挝史料摘抄》（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295—296。